

← (上接13版)

以及当时法国知识生产体制的塌陷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石。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拒斥现代性的普遍性要求时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就像利奥塔认为的那样:不存在单一的理性,只存在多种多样的理性,不存在一个巨大而唯一的理性,只存在多元的理性。在《事物的秩序》一书的末尾,福柯宣称:随着语言的存在越来越明亮地照耀我们的地平线,人终将逐渐消亡,

现代主义理念,认同后现代主义思潮开放包容的特性,力图在建筑领域中思考社会文化精神。诺伯格-舒尔茨借助北欧的地方性、人情味与珍重日常生活的文化传统,拒斥了冰冷的、无视环境协调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潮流,从非物资主义的人性化需求出发,通过“面向事物本身”的路径,来回应的存在与建筑空间的本质关系,探索建筑中的本源性问题。

胡塞尔把现象学称为“科学的科学”,探究的是任何一种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先

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后已经很少再用“现象学”一词,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存在的思想”这一概念。海德格尔脱离现象学运动之后,现象学研究在德国逐渐沉寂下去,重心开始转移到法国和比利时。不过诺伯格-舒尔茨似乎对“现象学”一词情有独钟。

城市文化地理学的维度

城市文化地理学可以说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涉及文化地理学和都市文化研究等不同的学科。早在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就认为地理因素应该替代时间因素,居于学术研究的突出地位。在他的这一思想和早期的文化地理学思想影响下,索尔提出了关于文化地理的重要论点,主张用文化景观来表达人类文化对景观的冲击。他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要素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性,文化景观既有自然景观的物质基础,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作用,他还强调人文地理学是与文化景观有关的文化历史研究。受索尔影响的美国文化地理学者们被称为文化地理的伯克利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地理的研究除了对文化景观、区域文化的历史的探讨之外,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将空间扩散分析法应用到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形成了文化地理的瑞典学派。概括来说,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一门人文地理分支学科,也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地理学问题受到了历史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地名学等地理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范畴下的一个亚分支,是研究不同地域特有的文化,以及文化渗透、转变关系的一门学科。它研究地表各种文化现象的分布、空间组合及发展演化规律,以及有关文化景观、文化的起源和传播、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环境的文化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旨在探讨各地区人类社会的文化定型活动,人们对景观的开发利用和影响,人类文化在改变生态环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该地区区域特性的文化继承性,也就是研究人类文化活动的空间变化。都市文化研究力图解析都市与文化的内在联系。都市文化研究的兴起要追溯到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创立的都市社会学。列斐伏尔和

福柯20世纪70年代对于空间问题和都市问题的研究,赋予了都市文化研究深刻的哲学内涵和广阔的思想文化史视野。列斐伏尔1974年出版了巨著《空间的生产》,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和错误的看法。1976年福柯在《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中,同样讨论了空间的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命运,这次讲演后来演变成了福柯1984年发表的论文《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福柯试图纠正西方思想史长期忽视空间问题的倾向,重新平衡时间与空间观念的探讨。

从城市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讨论诺伯格-舒尔茨的建筑现象学,有助于我们思考空间意义的复杂性和场所精神观念的独特贡献。列斐伏尔和诺伯格-舒尔茨都认为空间是充满意义的,在列斐伏尔看来,当代的众多社会空间往往矛盾性地互相重迭,彼此渗透。诺伯格-舒尔茨则认为建筑物及其他环境构成的空间应该被理解为场所,场所观念揭示了空间物质属性之外的特殊情感精神。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诺伯格-舒尔茨同样认为场所精神显现了那些较难触知体验的文化联系和人类在漫长时间跨度内因使用它而使之赋有的某种环境氛围。列斐伏尔关注的是空间中纠结交缠的各种权力关系,诺伯格-舒尔茨则关注客观物理环境与人的主观意识系统相互交流而产生的一种和谐关系与情感体验过程,这是人的意识和行动在参与过程中获得的一种场所感。场所精神试图聚焦空间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个人记忆的物化和空间化,以及人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列斐伏尔同样强调了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

列斐伏尔和诺伯格-舒尔茨都认为空间或场所是与人的存在休戚相关的,在列斐伏尔看来,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了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列斐伏尔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

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诺伯格-舒尔茨同样认为场所是存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场所是一个具体的‘这里’,有特殊的认同性(identity)”,场所不仅仅是抽象的区位,而是定性的、“整体的”现象,“由具有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物所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物的总合决定了一种‘环境的特性’,亦即场所的本质。一般而言,场所都会具有一种特性或‘气氛’”。而存在也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Dasein),是人的存在的不可还原的“给定性”。场所精神植根于为人类提供“诗意栖居”的空间结构体系上,人的记忆、价值和经历会与场所发生互动,形成情感依赖,这种依赖在人与环境之间起到重要的联结作用。在诺伯格-舒尔茨看来,“由于场所是复杂的自然中定性的整体,因此无法以分析的、科学的概念加以描述。”但是,“诗有办法将科学所丧失的整体性具体地表达出来”(皆同上,7页)。

场所精神的情境、归属和文化三要素的有机组合,构成了场所精神的灵魂内核;场所精神对于思考当代诸多空间困境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场所的沦丧,意味着都市空间的和谐性的被干扰和破坏,其结果是“节点、路径和区域丧失了它们的认同性,市镇成为其假想的一个整体。传统都市结构沦丧的结果是,地景失去了它的意义成为广泛的扩展,而且被简约成在人为元素所形成的复合网状组织的残渣……事实上现代环境很少提供古老建筑之所以迷人的惊奇和发现。想打破一般的单调时,大部分又变成恣意的幻想”(《场所精神》,186页)。这些病相,“就一个自然的场所而言是聚落的沦丧,就共同生活的场所而言是都市焦点的沦丧。大部分的现代建筑置身在‘不知何处’;与地景毫不相干,没有一种连贯性和都市整体感,在一种很难区分出上和下的数学化和科技化的空间中过着它们的生活,‘不知何处’的感受同样发生在室内……一般而言所有的品种都沦丧了,可以说是一种‘环境的危机’”(同上,186-187页)。总之,场所精神保护的场所的本体特性及其对城市和公众的意义。场所精神的守护,延续和增强了城市空间的生命与活力,是维护和提升城市品质和文化魅力的重要路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阿尔内·科尔斯莫和诺伯格-舒尔茨共同设计的全玻璃外立面住宅

“人的面孔终将沉入海边沙地之中”。福柯宣布了“人”的死亡,拉康则肯定了心理分析的反人道主义本质。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剖析过现代哲学的人道主义的复杂性,他认为启蒙尽管有明显的解放性的意图,但是现代理性的诞生仍然被解释成:从某种普遍性的标准出发,外在性地强加于事物之上的一种否定性的、驱逐性的、歪曲性的力量。德里达则认为现代理性在诞生时就必定隐藏着“暴力”,它必定会拒斥从内部威胁它的一切,可以说,对人文主义的形而上学根基的质询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关注的焦点。

诺伯格-舒尔茨在同一时间段里选择了一条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既相同又不同的理论道路,诺伯格-舒尔茨在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领域分享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同样批判了强调功能主义和形式化,强调普遍化、抽象化、分析性和科学性的

“经验性”的探究方式其实是回归到了比康德更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原则。德里达曾经这样批评康德:批判美学在使形而上学衰退的同时,开放了通向本体论的道路。诺伯格-舒尔茨的理论立场在此显然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分道扬镳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诺伯格-舒尔茨的建筑现象学其实与胡塞尔的思想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主要来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学的现象学方法:“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及《筑居思》(1954)则是基础和先驱性的论著。”(诺伯格-舒尔茨著、尹培桐译《存在·空间·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15页)胡塞尔虽然说过:现象学就是海德格尔和我,海德格尔也将他的划时代巨作《存在与时间》题献给了胡塞尔,但是海德格尔的理论工作却拒绝了从先验主体开始的出发点,并承认意义具有历史性。海德格